

网络文学互文性“污染”中的“作者”主体“漩涡”及其再中心化与溢散分向*

王世灿,唐小林

(四川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摘要:多文本生产叠加以追求符号添加值的“数字化新媒介文学生产方式”,已成为网络文学的总体语义域。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污染”设想在此发展为一种可行的符号重构模式。在普遍互文场,文本“污染”进一步牵动主体“污染”。“污染”阐释矩阵强化了网络文学文本间——“作者”间的关系,并赋予了“作者”主体比喻性的“漩涡”型意义。写作者和由读者、平台、AIGC所构成的“参与式作者”一同“创作”,形成主体“漩涡”方阵。克里斯蒂娃的“污染”意指“必要的重复”,这为网络文学通过审美整合保持“审美阶段”的“污染”秩序,以及由此走向精品化提供了理论参照。在网络文学的“一次叙述化”中,该秩序既能帮助写作者应对低质量的“污染”拼凑,提升文学性;也能协调“漩涡”主体的夺权威胁,使写作者在“消解—对抗”中再中心化。同时,“污染”使网络文学在“二次叙述化”中扩展其编码形式。文学场的读者在改编场获得叙述权,转化为新“作者”,其主体溢散分向表现为平台商业精英和民间自由读者这两端。“漩涡”现象回应了当前网络文学亟需探讨的“作者”主体问题,是增进网络文学理论建构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网络文学;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污染”;符号主体;广义叙述学

DOI:10.13568/j.cnki.issn1000-2820.2026.04.014

中图分类号:I206.7;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26)04-0150-08

网络文学叙述中的阐释矩阵总是趋向以“轴向位置”为中心。相比传统平面文学,网络文学将这一位置标记为与写作者直接相关的“我”(话语主体)。“我”承载着写作者“理想自我”的叙述驱力,并向中心位置集束。但在网络文学的叙述中,此轴向呈现出动态性,其根源或许在于“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的作用。近年,艾米莉亚·安格洛娃(Emilia Angelova)、苏尔蒂·辛格(Surti Singh)、范妮·瑟德巴克(Fanny Söderbäck)等重新探讨了克里斯蒂娃的思想。她们从语言学层面把克氏对互文秩序的阐述归结为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污染”(contamination)相类似的“重复”,且是一种“必要的重复”(necessary repetition)。^①“污染”在于某些特定的符号重复和文本间互动。不同文本必然携带相异的主体意识。当文本因彼此表意实践而获得联通可能时,文本及其符号主体会同时发生“污染”。这是普遍互文场中的常见结果。从全文本视域看,网络文学中的符号重复不仅取决于署名写作者的个人操纵,还依赖于读者反馈、平台机制和AIGC生成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基于这一现实,本文将读者、AIGC与网络文学平台工作性地概括为非署名意义上的“参与式作者”,并将传统意义上的“作家”还原为写作行为中的“写作者”身份。在互文性“污染”作用下,上述各方共同卷入网络文学的表意过程,进而构建共享“作者”之名的关系性主体结构。可以说,“污染”强化了文本间关系与“作者”间关系,也打开了主体间关系的空间。在该空间中,不存在单一、绝对稳定的话语主体。当遇到文本交流链末端的异质性主体,或者在其他文本中接近他者的元语言化身时,意指过程便会赋予主体比喻性的“漩涡”型意义,主体结构以一系列“模仿”的形象出现。但在该空间内,同一性常被理解为整体性,而整体又容易被视为实体的结构化。这往往会引导人们忽视话语主体各自为营的一面,而将其当作理所当然的一体化“作者”。

截至2026年,距克里斯蒂娃发表《诗歌语言的革命》已有50余年之久。彼时文学文本的写作者主体要达到“漩涡”意义尚有难度,因为“所能接触到的文本只是这个真实的广阔的文本世界的很小一部分,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网络奇幻文学与青年群体互动研究”(24CZW105);四川网络文学发展研究中心课题资助成果“新大众文艺视域下四川网络奇幻文学‘不可能’叙事的创新性研究”(WLWX-2026003)。

作者简介:王世灿(1999—),四川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符号学、叙述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See Angelova E,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Fifty Years Later: New Directions in Kristeva Stud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24, p. 17.

难完全实现她对互文性的构想”^①。进入“数字—网络”媒介时代后,实时交互性文学成为现实形态。多文本生产叠加以追求符号添加值的“数字化新媒介文学生产方式”^②成为整个网络文学的语义域。此时,巨量文本如海啸般涌向网络文学的生产通道。文本如潮,主体也随之如潮。“作者”在智能技术加持下对多文本的处理能力也显著提升,在喧嚣与浮躁中,“作者”主体的“漩涡”如期产生。

围绕网络文学“作者”主体归属问题,学界已从不同方向展开讨论。较早研究如周迎、丁光梅、董希文等已注意到网络文学的开放性、交互性与主体共在特征。其后,许苗苗、陆朦朦、李连群等又将研究推进到写手类型、互动生产与身份认同等层面。近年随着平台化加深,相关研究进一步转向网络文学数字劳动、平台规训与读者赋权。张铮、吴福仲、胡慧、王溥、张志安等的讨论表明网络文学写作是平台机制、读者反馈与流量逻辑共同介入的复合型生产。与此同时,禹建湘、李玉萍、彭民权、晏青等关于AIGC、人机共创与作者身份重塑的研究,凸显出生成式人工智能语境下网络文学“作者”主体归属问题的前沿性与复杂性。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禹建湘与张浩翔已从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污染”出发讨论网络文学的符号重构问题,具有启发性与参考价值,但对“作者”主体归属问题,尚未展开专门论述。^③现有研究已从主体间性、作者角色、平台劳动与人工智能介入等路径触及网络文学“作者”问题,但多聚焦于单一关系或局部变量。文本间互文关系如何演化为写作者、读者、平台与AIGC共同卷入的主体重组,仍有待作整合性的符号学阐释。

基于此,网络文学互文性中“间性”编码所导致的“作者”主体归属分裂,才愈益成为一个亟待细究的问题。尤其在AIGC参与之后,人作为主体的轴向位置感知进一步受到冲击。无论是技术协作、消费反馈、平台规训还是IP价值变现,都表明网络文学中的“作者”已无法由单一主体加以说明。回到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若立足广义叙述学,从互文性规则的“污染”出发,便可把文本互文问题推进为主体互文问题。结合写作者、读者、平台与AIGC论述“作者”主体的“漩涡”、再中心化与溢散分向,既回应网络文学的现实症候,也推进网络文学“作者”理论的新展开。

一、网络文学互文性“污染”中的“作者”主体“漩涡”

认知差与文本爆炸是网络文学互文性“污染”的推动逻辑,两者皆能作用于“作者”主体。所谓认知差,主要源于主体间不对称的交流与取效。写作者因认知高低产生的落差势能使交流展开,这时网络文学作品便起到关键作用。作品以意义形式介入,主体间性也借助文本间性完成自身建构。同时,网络文学由于受制于文学场中经济他律极的控制,充斥着巨量的共时文本。主体交流遂被文本爆炸语境所包围。写作者为求作品生存,与不同文本互文,就成为共识。此过程巩固了文学类型的识别机制,帮助写作者评估意义构筑中的认知差,从而为应对文本爆炸做出预设。这两个逻辑因素助推了“作品—作者”间性的互动,并提高了网络文学的“污染”强度。

一般而言,能被“污染”的是那些具有可述性的重复符号,重复率越高说明可述潜力越大,即“值得说”。这种“污染”品质不仅表现在情节与故事上,也表现在人物乃至思想上。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的“污染”是“必要的重复”,这表明其须是与作品的情节、人物等意义形式存在直接关联的符号。但问题在于,“必要”的判定主体是谁?是由过去正典认为的“灵魂作者”裁断吗?就网络文学而言,这显然有违常识。也许追溯到网络文学的类型特征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络文学高强度的互文性“污染”致使“类的文学”成为其常态表征。其类型创作强调适应“众数”的要求,其故事以集体的方式培育继承者,即借助“污染”在“量”中延续自身。因此,多文本下的多主体成为应有之义。这回应了上述问题:“必要”的判定主体并非单一、确定的唯一性主体,而是写作者与多方“参与式作者”,共同构成“作者”空间的符号矩阵。也就是说,“众数”决定了“众意”。不过,真正承担叙述整合与意义定向任务的,仍主要是写作者。

①钱翰:《在人工智能时代重申对话性与互文性概念》,《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1期,第180页。

②单小曦:《媒介与文学:媒介文艺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0页。

③参见禹建湘、张浩翔:《网络文学符号重构的互文性“污染”——〈诗歌语言的革命〉发表半个世纪后的符号图景》,《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第194—204页。

那么参与式“作者”主体如何编织网络文学的互文性“污染”?1966年,克里斯蒂娃颠覆了文本的独立中心观,提出“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①,并指出互文功能可在文本结构的不同层次上被解读。对克氏而言,文学实践的本质是文本问题。网络文学写作者的互文创作尤其如此,不仅需要面对“显性伴随文本”和“生成性伴随文本”,其中最特殊的是与“解释性伴随文本”的互文。这些文本构成伴随文本集群,深度影响写作者的主体选择,但克里斯蒂娃阐述的互文性基本只涉及“生成性伴随文本”。在严格恪守理论的同时,结合网络文学实况及克里斯蒂娃“文本之海”的未来想象,有必要借助赵毅衡对“伴随文本”的讨论,将其余两种伴随文本纳入分析,以增强学理性。

赵毅衡将“伴随文本”定义为伴随着符号文本一道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并将其分为三大类。其中,“显性伴随文本”即显露在文本表现层上的伴随因素,一般比文本更为醒目,下分“副文本”“型文本”;“解释性伴随文本”是文本产生后出现,在文本解释时起作用的成分,下分“评论文本”“链文本”“先后文本”;“生成性伴随文本”是文本生成过程中,各种因素留下的痕迹,下分“前文本”“同时文本”。^②“参与式作者”通过伴随文本加入到网络文学的整体创作“污染”之中,进而影响文本生产、情节生成与意义理解。

首先,读者在解释性伴随文本——“评论文本”层面成为“参与式作者”。评论文本可分为文字评论文本、语音评论文本、图片评论文本三种,内容有随意感言、情节指点、人物点评、逻辑指摘等。读者订阅付费章节后方可评论。他们以资本支出换取对叙述的干预可能,其主要渠道是作品评论区与论坛。在集体匿名评论机制与有偿消费心理作用下,读者之间甚至会形成评论文本的“同声”。即便一些零星的评论文本还无法“污染”作品,评论“同声”却能迫使写作者做出改变作品的决定。如爱潜水的乌贼在《宿命之环》第二部结束的总结章中就细致回应了读者先前讨论中有疑问的地方:主角卢米安心理沉默与情绪爆发的矛盾关系处理、金鸡旅馆作为该部重要社会性活动空间的完整性、真实性构造等。^③《圣墟》的辰东甚至表示:“大家的留言与反馈我都认真看了,体会到部分书友的心情……所以,我决定重新写圣墟的结局。”^④还有《恶魔法则》《诡秘地海》等网文都不同程度地有过此类情况。为回应读者,写作者除接受作品被读者“污染”外,还会通过评论回复、章末“作家说”、免费小剧场等方式加强互文。因此,通过评论文本,读者甚至能转被动为主动,在反套路化、反“注水”、提供审美期待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成为“作者”之一极。

其次,平台在显性伴随文本——“型文本”层面成为“参与式作者”。网络文学平台依托数字设施和网络系统组织文学活动,呈现为非直接生产性的经济弥散景观。其中,不同作品遵循其作为一种“构造物”的传达语法规则。这直接表现于平台对作品的“型文本”,即作品所属类型的划分上。如起点中文网将作品分为玄幻、奇幻、武侠等;晋江文学城将作品分为言情、纯爱、衍生等;番茄小说在男女频内将作品分为西方奇幻、古风世情、科幻末世等。在这些一级主类下还有多级子类,呈现为“主类+子类”,以及相互交叉的结构。这些类型分区内还设置排行榜单,形成作品类型规划与各种展示排序。这表明平台掌握了型文本权力,并能以此“污染”作品,使作品成为框架产品。写作者的故事创作由此偏向设定创造。基于职业化、明星化制度,写作者在进入平台资本驱力环境的过程中就已默认自己会被俘获和吸收。类型结构有利于写作者编排作品。上传作品时选择平台授予的热门标签,也能使作品被读者快速检索,并在短时间内集聚人气。但这也致使作品囿于型文本的“污染”规训中。这时,隐藏在作品型文本背后的平台作为“框架主体”便以高位方式择取了写作者的部分主体性,从而成为“作者”之一极。

最后,AIGC在生成性伴随文本——“同时文本”层面成为“参与式作者”。在网络文学生成过程中,“前文本”与“同时文本”都会留下痕迹。AIGC主要作为“同时文本”参与写作,呈现为一种具有“生产力”^⑤的文本。它可以在深度学习的基础上根据写作者的要求快速搭建情节与故事,从而外化为同时文本

①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祝克懿、黄蓓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50页。

② 参见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0—148页。

③ 参见爱潜水的乌贼:《宿命之环》,2023年7月12日,<https://www.qidian.com/chapter/1036370336/759746846/>,2026年7月22日。

④ 参见辰东:《圣墟》,2021年3月19日,<https://www.qidian.com/chapter/1004608738/641695362/>,2026年3月12日。

⑤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史忠义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1页。

供写作者选取、改写或扩展。将AIGC在写作者引导下生成的文本限定在同时文本内,一方面与它和作品生成之间的近时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叙述能力的局限有关——缺乏合理的文本细节架构能力,只是“被动符号主体”^①。这反而促进了同时文本与作品的互文性“污染”。诸如阅文集团“妙笔”、通义千问、讯飞星火等AIGC,在写作者的调用中,以“像人的机器”介入叙述生成,亦成为“作者”之一极。

参与式作者与写作者一同“创作”网络文学作品,不同主体凭借互文路径共筑“作者”主体“漩涡”。依据各方介入创作的功能理据,可将四个主体的关系表示为主体“漩涡”方阵,方阵中出现四种对“轴向位置”的“漩涡”主体的可能影响(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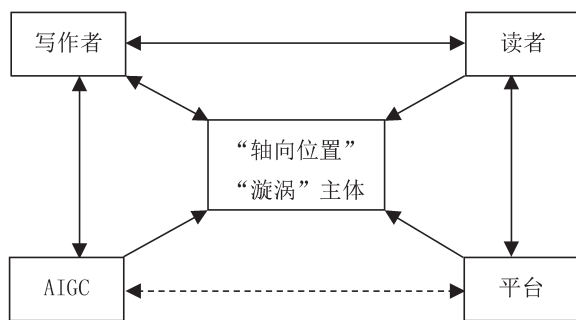


图1 网络文学互文性“污染”中的“作者”主体“漩涡”方阵

读者、平台、AIGC分别借助评论文本、型文本和同时文本,对写作者的作品构成“污染”。这些分散主体之间的联系和功能都建立在“污染”基础上,它们根据相似性、对立性,或通过转化,或通过整合,实现相互连接。这三者与写作者共同形成向“轴向位置”聚拢的强大动力——转喻的“我”。这个“作者”作为整个矩阵空间的“漩涡”主体,能处理多主体附加噪音;又因关系黏性较强,无法被简单分解,近似克氏所谓“进程中的主体”,在互文过程中形成。但该主体无法实例化,其唯有再对写作者“污染”,形塑写作者,内化于写作者,才能与网络文学作品构成同一的实在。至此,“污染”中的网络文学“作者”可被理解为具有“漩涡”主体性的关系性主体结构,而写作者则是这一结构在具体叙述中的主要承担者。

二、网络文学“一次叙述化”“污染”中“作者”主体“漩涡”的再中心化

到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互文性“污染”,保留了克里斯蒂娃原概念中的颠覆性、排斥性与越界性,也避免将“污染”直接等同于积极的审美价值。就其原初含义而言,“污染”首先意味着对既有边界与秩序的扰动,它使文本与主体暴露于异质性侵入之中,并可能引发排斥、焦虑与失衡。正如克里斯蒂娃在《恐怖的权力:论卑贱》中已将“污染”提升到主体—文化层面,并指出“污染中必然伴随着某种排斥”^②。本文之所以仍采用这一概念,在于网络文学的多主体共写现实,恰恰展示了“污染”在数字媒介条件下的双重面向:一方面,它以颠覆、排斥与侵入等方式打破单一“作者”中心,使文本间关系进一步牵动主体间关系,构成“作者”主体的“漩涡”状态;另一方面,这种扰动并不必然导向无序与降格,只有当其进入写作者的审美统摄并被纳入叙述整合过程时,“污染”才可能由否定性力量转化为具有生成性的叙述资源。故而,本文对互文性“污染”的运用,是一种限域的、过程性的理论操作:它首先是对“漩涡”这一扰动结构的描述,其次才是在特定条件下对其审美转化的讨论。

克里斯蒂娃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讨论主体与身体驱动力时,将二者的分离看作是语言秩序打开的唯一途径,她将这一过程称为“审美阶段(thetic phase)”^③。对于网络文学而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写作者以驱力愿望进行审美性的互文,才可能使“污染”转化为具有生成性的“污染”秩序。

不过,网络文学的“污染”秩序显然面临两类主要威胁。其一,AIGC输出的同时文本“崇拜”既有语法规则,存在“过程遮蔽”;其二,网络文学套路化的“污染”互文模式有潜在的凝固倾向。写作者在面对这

①参见唐小林:《信息社会符号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150—153页。

②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恐怖的权力:论卑贱》,张新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04页。

③Kristeva J,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ans. Margaret Wall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43-46.

两类威胁时,可能表现出分化态度:一是彻底接受AIGC成果与类型套路;二是保持驱力愿望,在斟酌参与式作者提供的文本中,保持高度主体性。正是后者,能使写作者较好地应对主体“漩涡”的冲击,可从以下两个层次展开讨论。

第一,AIGC“过程遮蔽”的同时文本始终处于异质性“质料”维度,写作者可以依托网络文学俗艺术体裁的“选择富厚”,让“污染”进入过程性,并生成审美效力。该过程即“一次叙述化”(简称为“叙述化”),发生在作品写作的阶段。^①写作者需要搜寻必要重复符号,将其加入作品,同时营造叙述性。一次叙述化充分体现在写作者应对威胁的两个层次中,包括媒介与情节。对网络文学而言,媒介主要是语言文字,写作者与AIGC皆能掌握。真正产生意义歧出的环节在于情节。AIGC可给出情节,前提是大量学习前文本。因此,它帮助写作者形成的同时文本,常携带过往的叙述程式,其中不乏僵化后被淘汰的套路,也未必能把既有文本符号和语言秩序转化为有效呼应。且AIGC生成的这种情节结构文本具有“过程遮蔽”特征,也就是“选择—创作”过程不能显现。其中,AIGC作为他者,缺少写作者对线上与线下多属性不确定因素的敏感性。它只按部就班地处理第一人称写作者给予的指示。解释匮乏使其成为第三人称的“它”,其文本涌现行为也处于可知与不可知的跨界连接状态。写作者的大数据学习能力不及AIGC,却能占有符号态的情动力量,可在自身的情节生成中截取任一次意向叙述结果,合成选择性终结情节。

与此同时,写作者还具有优势明显的“选择富厚”基础。网络文学多属俗艺术形态,享有自由且极宽的选择边界。表现在,一是跨体裁文本的互文。如《无限恐怖》(zhhtty)、《全职高手》(蝴蝶蓝)对电影、漫画、游戏的互文。二是跨文化的互文,或跨中西文化,或跨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如《道诡异仙》(狐尾的笔)、《我不是戏神》(三九音域)、《银蟾记》(阮郎不归)就将中式民俗、服饰、戏曲等与西式克苏鲁、当代世俗相结合,异质元素由此成为写作者演绎中华文化母体的符号集合。三是热门作品符号联动。如以极地旅者《系统流主角的我加入聊天群》为代表的“聊天群小说”,就将众多网络小说中的设定道具作为主角的系统待抽取物,同时汇集多本小说的人物符号,使其脱域并共置于诸天聊天群,由写作者进行模仿叙述。四是经典符号“融梗”。如《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言归正传)中的“苟”与“稳健”梗,《大王饶命》(会说话的肘子)中的“气人变强”梗,以及《亏成首富从游戏开始》(青衫取醉)中的“越亏越富”梗,等等。

写作者借助更具主体意愿的“选择富厚”,获得了更宽的选择空间。不同符号的重复会将原语境中的意义一并带入作品,并在新语境中继续生发,使“污染”后的文本呈现新意与旧意交织的状态,更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AIGC同时文本因“过程遮蔽”而显出的技术理性局限,并重新注入写作者审美性的意志分节选择。

第二,网络文学套路化的“污染”互文模式潜藏凝固倾向,但写作者仍可通过作品内部意义世界的“存在互渗”重建“污染”秩序,进而生成审美效力。主体“漩涡”中的各方都会促进类型的形成:平台提供“型文本”标签;AIGC提供数据库中海量类型作品抽离重组而成的同时文本;读者在阅读中提炼鲜明的特征要素;写作者则综合各方,生产既能适应市场也能兼有情怀的类型作品。此外,评奖评榜、赛事制度,以及数字化新媒体文学生产方式,这三项要素也在持续推动套路化。

但从发生学看,网络文学的生成程序本质上仍是符号性的,网文也被称为“欲望作品”。原初“污染”中的压缩与置换、吸收与排斥、抛弃与停滞,都会作为语言习得的先天条件进入写作者“记忆”,使其意识到套路化对文学性的潜在损伤。互文转置的文学性潜能,恰在于从“一个能指体系向另一个能指体系的过渡”^②中实现审美表达。基于这种“记忆”,写作者在与型文本的互动中能形成对类型标签重复性的认知图式:既然一个或多个标签可以标记众多作品,而一部作品又常被多个标签同时覆盖,那么创作便能在“有标签”中打开“无标签”的空间,以“无序”生成新的“有序”。同时,作品分类的后置性也表明,分类实践始终处于“未完成”与“待完成”状态,这恰恰说明写作者在创作中仍拥有较大的敞开空间,可以不断输入审美想象。近年兴起的短篇创作,以轻文本、反套路、高情绪的叙述策略参与推动文学生态变迁,正说明写作者的自由度并未被类型的套路完全封闭。

这为写作者搭建实在世界、可能世界与不可能世界的互渗关系,即“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个部分

①参见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6页。

②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组成一个系统、一个整体”^①,并由此生成审美效力,提供了基础。写作者在一次叙述化中,往往先参照既有文本设定作品的实在世界,再在述本中建构可能世界。其建构既包括“世界建构元素”——自然领域、人文环境、活动生物,也包括“本体功能推进命题”——物质性和力量体系。^②此外,也会有意突破实在世界的矛盾律与排中律,生成“非自然”的不可能世界。其中元素虽在现实中不成立,却都属于文学有灵个体的心理可能世界,因而也构成文学性。写作者则通过互渗保持故事世界的整合运作,在此有限范围内,编码活动仍是开放而自由的。这允许写作者以任意的文化方式定义世界,使差异符号彼此“污染”,形成创新空间。以《十日终焉》(杀虫队队员)为例,各个参与者所属的多个现实“子可能世界”汇集于虚构的“终焉”“母可能世界”。十日循环的无限“否叙述”,使终焉之地成为“地狱一日常一神话”的三性结构。世界的重复互渗打开了“人性—信念—超凡”的“奇幻现实主义”审美意义,使其一时成为霸榜之作。

一次叙述中的“选择富厚”与世界“存在互渗”,是写作者在对低质量“污染”拼凑时主动建立的审美策略。它一方面重新联结“漩涡”中破碎的主体区域,另一方面也在叙述整合过程中推动中心主体重新凝聚。由此,写作者在对“污染”否定性力量的审美转化上,不仅强化了文学性,也在与读者、平台、AIGC的消解与对抗中实现再中心化。归根结底,只有兼具理性与感性意志的写作者,才能抵御这两重威胁,并借助AIGC提供的“创意”,生成情节合理、细节饱满、情感动人的文学效果。

三、网络文学“二次叙述化”“污染”中“作者”主体“漩涡”的溢散分向

如果说一次叙述化中的“污染”,主要指向写作者在写作现场“漩涡”中的再中心化,二次叙述化中的“污染”,则更多呈现“作者”中心在改编场中的溢散分向。网络文学不再仅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组织作品。经济他律极激发的驱力,会通过“易化”阻碍打开便捷通道,使安慰、兴奋或刺激成为可能,并进入复合符号的新媒介场。其中,作品会得到重读、强调、改编,实现“污染”扩散。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已突破传统封闭文本的单一媒介形式,即语言文字与意义的双重分节对应关系。随着文本之海逐渐形成,更可将其理解为多样媒介形式中符号意义动态生成的注脚。网络文学则借助IP这一文化因子,使不同媒介载体中的文本符码发生互文,并由此展开“二次叙述化”的典型实践。所谓“二次叙述化”,指对一次叙述化产出的作品进行再接受。它是在追溯情节意义中“不断构造的”过程,^③也是在理解中再次编码的过程。

对于网络文学而言,二次叙述化“污染”是对原著潜在意义的再创造。读者在二次叙述中再次对小说写作者形成主体压力,只是这种压力因叙述转向改编场而有所减弱。文学场的读者在改编场中掌握了原著意义的重编码权,因而能够成为新的“作者”,或助推或直接主导跨媒介改编,打造意义层的符号互动,并推进新的叙述循环。文学场与IP改编场并非截然分明,二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互文关系。二次叙述化使意义维度的符号在两个场中发生“污染”。通过跨媒介叙述,小说意义在新媒介中被重塑与传递。其中的核心是小说的情节—故事与人物形象,虽然变更了媒介体裁,但也能“让人一瞥就能辨认出这些作品都属于同一故事王国”^④。而“污染”的改编文本依据媒介结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分类:“文字—图像—声音”:电影、电视剧、动画、微短剧;“文字—图画”:漫画;“口语—声音”:有声书、音乐;“文字—身体—声音”:游戏、直播、漫展、文旅。高IP价值的网络文学,如上述提到的《凡人修仙传》《斗破苍穹》《仙逆》等的二次叙述改编文本甚至能囊括以上所有种类。这种改编超越了小说的一次叙述,其在媒介“污染”中完成多次意义迁移,推动网络文学在新媒介语境中深度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二次叙述化“污染”的主体进入改编场后,会以新“作者”的身份呈现出主体溢散分向。

一方面,处于平台专业化规制中的平台商业精英,或者说新媒介文学生产人,控制了清晰文化因子(版权IP)而成为二次叙述“污染”中溢散主体的一极。其背靠的平台不局限于网文平台,还包括其后的综合集团,大致有以下派别:BAT派,如腾讯阅文、阿里文学;独立分发派,如掌阅文学、中文在线;运营

①张旭曙:《形式的美学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5年,第25页。

②参见孙金燕、王世灿:《从网络文学到IP衍生:后期现代语境中民俗符号的表达转向》,《内蒙古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第149—159页。

③参见赵毅衡:《广义叙述学》,第106页。

④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4页。

商派,如中国移动的咪咕阅读;数字转型内容派,如磨铁文学、豆瓣阅读。他们拥有两套主力符号系统:经济资本系统与技术资本系统。依靠强大的符号系统支持,这些平台商业精英能对原文学场中的写作者形成掣肘。原文学场中的写作者,在转让作品IP以获取市场利益时,极少拥有挑选资本的机会。平台商业精英会综合考虑受众需求与投资回报率,重点关注二次叙述模式与“污染”文本产业链的延长。

因此,博弈关系常常把网文写作者推向改编场的边缘位置。具体而言,写作者常通过合同约定,将作品著作权财产权及其后续改编、开发控制权让渡给平台商业精英。在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写作者此后甚至不得再以与原IP同名或相似的名称进行创作。这意味着主导权由平台商业精英掌握。例如,2016年,永恒之火在个人公众号上发表声明,《儒道至圣》的版权已被起点中文网买断,自己无权过问该作品所产生的衍生收入;2007年,起点以10万元买断了天下霸唱《鬼吹灯》系列8部作品的全部著作权财产权。此后,该IP的影视改编权主要由平台资本主导,导致衍生作品质量参差不齐。面对这一局面,天下霸唱于2015年亲自操刀创作《鬼吹灯之牧野诡事》,却反被玄霆公司(起点)起诉侵权,并最终败诉。^①2012年,九夜茴在将《匆匆那年》的网络剧改编权转让给金狐公司后,也发生过类似侵权情况,尽管后来维权成功。^②总之,写作者确实难以再拥有已转让作品全部IP的话语权。不过,一些头部网文写作者会脱离平台,并成立独立融资的公司,收回版权到期的IP,然后在二次叙述中重获主体性。如,天蚕土豆创立“未天文化”,今何在成立“星汉时空”,南派三叔创立“南派泛娱”,独立运营名下IP的授权及影视开发。

另一方面,民间自由读者在网络文学及其二次叙述的“污染”景观中,掌握模糊文化因子,即版权边界处的元素互文,并通过数字超接触交换“感知—情绪”体验,形成趣缘“微型共同体”。他们活跃于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平台。出于对自身非专业性、侵权后果以及网文IP“情感—身份”认同的考虑,自由读者通常会调动多部小说及其改编文艺中的故事、术语、人物等,使其在意义层面上互动“污染”。这类二次叙述文本以短视频、直播、“COSPLAY”等为主。这种模糊IP的意义再生产,不仅契合“污染”秩序,也再次构建了共同体的情感一致性。尤其是AIGC带来的媒介技术壁垒突破,“污染”的范围扩大化、过程自由化、呈现多样化,体现出新大众文艺的鲜活性和

以UP主“王傲天的修仙日常”自2023年10月以来陆续二次叙述的短视频《重生之回乡修仙传》系列为例。这些短视频采取“重新命名+场景具身”的叙述技巧,与诸多网文符号互文。在“俗套网络文学的具象化处理”视频中,^③主角(具身作者)接受“家族太上长老”(家中长辈)之命为“家族灵药园”(玉米地)驱除“噬灵魔虫”(害虫)。随后,他驾驭“五灵追风辇”(五菱宏光汽车)前往“神农门”(农具店)购置法宝“布雨宝匣”(喷雾器)。视频将生活日常当作网文来“写作”,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出自《斗破苍穹》)、“吞天魔罐”(出自《遮天》)等互文符号,增强了二次叙述中一本正经地“修仙”的诙谐风格。整体而言,互文叙述碰撞出随性的新意义,使这种“污染”所带来的情绪释放与审美效果深入人心。

平台商业精英与民间自由社群在二次叙述“污染”中,都会关注文本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诗意及其媒介效果,使一次叙述作品中的潜在情节、人物关系和情节张力得到具体外化。尤其在改编的游戏文学中,“沉浸于另一现实的那种刺激”^④就在于游戏仿真了文学的世界架构,同时借助角色的虚拟身体“遍历”情节,将文学的“叠加态”叙述为“敞开态”,“污染”后的意义总量就在玩与读的循环中持续增长。须注意到,原作以情节、故事、人物等符号要素作为跨媒介文本的底本,成为具象化存在。这使空符号获得实在载体与内容,扩展了边界,翻新了意义,延长了审美生命。但“污染”并非单向,而是双向动态的。二次叙述的文本反身于原作,促成小说写作的可改编化倾向。同时,具象化的符号也在读者意识中留下先行印记,使其在阅读小说时自动对焦已二次叙述的元素。阅读想象受到符号互动限制,这可能又反向导致读

① 参见陈怡轩:《网文作者发起“五五断更节”,平台和写手为何积怨已久》,2020年5月6日, https://www.fortunechina.com/shangye/c/2020-05/06/content_364207.htm, 2025年1月17日。

② 参见杨得超:《〈匆匆那年〉著作权案终审维持原判,作者九夜茴获赔百万》,2019年9月18日,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6881632115187.html>, 2026年6月30日。

③ 参见王傲天的修仙日常:《俗套网络文学的具象化处理》,2024年7月1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w4m1e7RV?vd_source=79e3ea5a54859ac92284865c81d9a2e2, 2025年1月16日。

④ 玛丽·劳尔·瑞安:《故事的变身》,张新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92页。

者更愿意接受已经二次叙述的改编文本,而不愿意再“啃”大部头的长篇网文。

四、结 语

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污染”的符号学设想,在当今网络文学的数字生产方式中已转化为现实的符号重构模式。网络文学的生成与改编推动符号意义流动,也使写作者、读者、平台与AIGC卷入话语竞争。“轴向位置”的阐释矩阵由此呈现为卷入、重组与再分配的“漩涡”状态。经由写作者的审美整合,“审美阶段”的秩序成为网络文学走向精品化的内在原则,写作者也在主体间性中实现再中心化。进入改编场后,读者转化为新“作者”,并沿平台商业精英与民间自由读者两端形成主体的溢散分向。置于作者理论的演变脉络中,网络文学赋予“作者之死”命题以数字媒介时代的新内涵。传统作者观将作者视为作品意义、风格与责任的统一源头,20世纪以来的作者理论则逐渐完成了从“源头论”向“功能论”的转折。AIGC介入后的文学生产进一步表明,作者已成为多主体“污染”中生成的关系性存在。网络文学由“唯一作者”推进至“被去中心化的作者”,又走向可再中心化的写作者。“作者”主体“漩涡”由此构成作者理论在新媒介文学生产中的新形态。网络文学未来的发展,仍有赖于形成以写作者审美统摄为核心,能够容纳读者反馈、平台规制与AIGC辅助的“污染”秩序。这一秩序承认多元行动者共同写作的现实,也坚持写作者在审美综合与意义定向上的不可替代性,构成人工智能时代重新理解网络文学“作者”问题的重要启示。

[责任编辑:查汗]

The Vortex of the “Author” Subject in the Intertextual “Contamination” of Network Literature and Its Re-centering and Dispersive Differentiation

WANG Shi-can, TANG Xiao-lin

(School of Litera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207)

Abstract: Multi-textual production oriented toward added semiotic value, as a “digital new-media mode of literary production,” has become the overarching semantic field of network literature. Julia Kristeva’s intertextual “contamination” has thus become a feasible mode of semiotic reconstruction. In the general intertextual field, textual “contamination” entails subject “contamination,” strengthening text – “author” relations and giving the “author” subject a vortex-like significance. The writer and “participatory authors” composed of readers, platforms, and AIGC jointly form a matrix of the subject vortex. As “necessary repetition,” Kristeva’s “contamination”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maintaining ordered “contamination” at the thetic phase through aesthetic integration. In primary narrativization, this order helps the writer resist low-quality patchwork, enhance literariness, and achieve re-centering. In secondary narrativization, “contamination” expands coding forms; readers acquire narrative agency in adaptation and become new “authors,” whose dispersive differentiation appears as platform-based commercial elites and grassroots autonomous readers. The vortex phenomenon addresses the urgent issue of the “author” subject and advance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literature.

Keywords: Network Literature, Julia Kristeva, Intertextual Contamination, Semiotic Subject, General Narratology